

商业银行税负、信贷规模与宏观经济波动

——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分析

崔文星¹, 杨艳武¹, 李超²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430073; 2. 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 贵阳 550025)

摘要: 商业银行是经济活动的金融中介,是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PVAR)模型考察商业银行税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税负显著降低了信贷规模,对经济波动的直接冲击效应显著且存在一定滞后性。同时,信贷渠道会放大商业银行税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该冲击效应要远大于银行税负的直接冲击效应。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应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总体税负、强化税收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充分释放税收“红利”,从而降低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关键词: 商业银行; 税负; 银行信贷; 经济波动

中图分类号: F124.8; F8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4)06-0046-06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税制结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商业银行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的关系十分密切^[1-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正向或逆向影响商业银行信贷供给,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5]。在经济周期处于不同阶段时,商业银行税负的变化往往更能够揭示银行信贷、风险和经济波动的重要信息,通过调节经济周期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而增强银行信贷行为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稳健性,有助于“熨平”信贷亲周期效应,实现逆周期宏观调控的效果^[6-8]。由于商业银行面临外部宏观经济波动和内部经营管理风险,容易引起整个宏观经济波动,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与传统行政手段监管相比,税收宏观调控手段具有间接性、普遍性的比较优势。因此,通过税收手段降低银行经营行为对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成为业界和学界重点关注问题。本文将税收制度因素纳入商业银行与宏观经济研究框架,研究商业银行税负如何通过各宏观经济变量的传导对经济波动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优化商业银行税收制度,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1 文献回顾

商业银行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税负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西方主流学者主要将银行税收制度视为“中性”,在考察银行信贷特定传导路径来影响经济波动中较少考虑了税收因素。有关银行信贷对经济波动影响的主要是资产负债表渠道(the Balance sheet channel)和银行信贷渠道(the Credit channel)导致的。一方面,Stiglitz等^[9]、Bernanke等^[10]认为资产负债表渠道着重从信贷资金需求角度分析企业自身财务状况影响企业所获得的信贷资金,强调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企业所面临的内外融资成本不同导致不同财务状况企业获得信贷资金存在差异,并放大经济波动的现象。另一方面,Auerbach^[11]从信贷供给角度发现考察税收政策确实对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产生了显著影响^[11]。

部分学者探讨了税收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Giavazzietal^[12]、Romer和Romer^[13]、Dreher^[14]均认为税收的增加是一项高度紧缩的政策,容易引起经济增长的波动。闫肃^[15]比较详尽和系统地分析了从宏观层面上考察了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得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不足的结论。

收稿日期: 2023-09-23

作者简介: 崔文星(1981—),男,宁夏盐池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理论与政策;杨艳武(1991—),男,山西吕梁人,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李超(2000—),男,四川宜宾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税务管理。

近年来,学术界进一步探讨了商业银行税负与宏观经济的关系,黄宪和熊启跃^[16]认为应增强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减少银行信贷行为的逆周期效应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Kastropet 等^[17]研究显示不健全的财税体制不能有效防范危机。邢锋^[18]发现金融行业税负的提高和税收总量的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

综合上述分析,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税收政策在引导商业银行进而影响整体宏观经济中的作用^[19-20],但仍存在研究范围过窄、识别方法不够准确等问题,对于税收通过何种渠道影响经济发展没有详细的讨论。因此,本文基于商业银行税收的特点以及宏观经济波动指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对商业银行税负、信贷与经济波动关联性展开研究,进而提出改进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①将商业银行税负问题与金融发展纳入到统一的宏观经济系统中,并探讨了通过银行信贷这个特定的渠道影响经济发展;②基于商业银行微观数据,在实证分析中识别出税收负担、信贷与经济波动三者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完善金融业“营改增”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③从税制设计的角度出发,考虑税收负担对商业银行稳健性经营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为解决税收制度设计与商业银行发展阶段之间的错配提供参考。

2 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2.1.1 数据来源

选取全球银行和金融机构分析库(Bankscope)数据库中全部商业银行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缺失数据通过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银行披露的年报或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网站和各大商业银行网站手工收集加以补充,并按照如下原则对样本银行进行了筛选:①银行样本只保留商业银行;②同一银行至少有连续三年的数据。因此,经过筛选,最终样本包括 155 家商业银行 2010—2019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此外,其他宏观指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

2.1.2 指标选取

综合现有研究和研究主题,选择商业银行税负、信贷规模、经济波动等变量的代表性指标,运用

经济计量的方法,分析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和作用机制,具体选取方法和指标如下。

(1)宏观经济波动(lnGDP_hp)。借鉴方福前和邢炜^[21]、逯进和王金涛^[22],采取滤波方法(HP)计算经济波动的情况作为代理变量。

(2)商业银行税负指标(lnFT_hp)。参考刘骏和刘峰^[23],采取现金流量表的企业税负衡量指标,银行税负表示为:银行税负=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营业收入。

(3)商业银行信贷指标(lnCredit_hp)。参考钱先航等^[24],选取银行贷款增长率作为银行信贷规模的代理变量,它等于贷款金额的变化量与上一期贷款之比,该变量从动态角度衡量贷款的变化情况。

2.2 模型设定

一般而言,对于经济波动和商业银行税负、信贷规模之间的这种联动关系的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方法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VAR 模型的特点在于将模型系统内部的每一个变量均当作内生变量,考虑变量之间的双向动态影响。但由于目前我国可比的商业银行税负、银行信贷规模和经济波动的年度数据(2010—2019 年),并不能满足 VAR 模型的数据长度,为了弥补数据长度的不足,使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PVAR)估计方法建立如下的 PVAR 模型。

$$\mathbf{Y}_{i,t} = \mathbf{B}_0 + \mathbf{B}(L)\mathbf{Y}_{i,t-1} + \alpha_i + \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mathbf{Y}_{i,t}$ 为模型所有内生变量构成的向量; $\mathbf{B}_0$ 为 PVAR 模型常数向量; $\mathbf{B}(L)$ 为滞后算子向量; α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epsilon_{i,t}$ 为误差项; i 为横截个体数($i=1, 2, \dots, N$); t 为观测时期($t=1, 2, \dots, T$)。在将 PVAR 方法应用到现实的数据分析时,实际上需要对数据产生很强的约束,即每一个单位横截面所隐含的结构是相同的,但该约束显然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固定效应来有效控制横截面单位之间的异质性。同时固定效应和滞后的因变量相关,采用的均值差分去除固定效应会导致估计量有偏。基于此,借鉴 Arellano 和 Bover^[25]的做法,确保变换变量和滞后回归子之间具有正交性。

2.3 检验与估计

与 VAR 模型类似,PVAR 模型中所有变量也要具有平稳性。若采用了非平稳的数据,则可能导致虚假回归。由于估计使用不变参数的面板数据模型,所以平稳性检验不再是单纯的增广迪基-富勒

检验(ADF),而是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单位根检验(表 1)。为了研究短期周期性变化以及样本数据平稳性的要求,采用 HP(Hodrick-Prescott)滤波消除时间趋势项,提取波动成分,作为 PVAR 模型实证分析数据来源。整体看来,各变量的周期性波动具有趋同的趋势。

表 1 数据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方法	输出统计量	临界值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10%	结论
lnFT_hp	DF-GLS	-3.391**	-3.770	-3.386	-3.049	平稳
	PP	-4.052***	-3.689	-2.975	-2.619	平稳
	LLC	-12.102***	-8.323	-6.309	-4.098	平稳
lnCredit_hp	DF-GLS	-2.104*	-3.770	-2.775	-2.407	平稳
	PP	-3.349**	-3.689	-2.975	-2.619	平稳
	LLC	-9.820***	-8.323	-6.309	-4.098	平稳
lnGDP_hp	DF-GLS	-3.901***	-3.770	-3.414	-3.067	平稳
	PP	-2.659*	-3.702	-2.980	-2.622	平稳
	LLC	-15.274***	-8.323	-6.309	-4.098	平稳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采用基于广义最小二乘估计量(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GLS)方法的退势迪基-富勒检验(DF-GLS)、菲利普斯-佩龙(PP)检验和左单端(LLC)检验对提取周期性变动趋势后的变量 $\ln FT_{hp_{i,t}}$ 、 $\ln Credit_{hp_{i,t}}$ 、 $\ln GDP_{hp_{i,t}}$ 进行平稳性检验。从表 1 数据平稳性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进一步经过 HP 滤波提取变量周期性趋势后, $\ln FT_{hp_{i,t}}$ 、 $\ln Credit_{hp_{i,t}}$ 、 $\ln GDP_{hp_{i,t}}$ 三个序列的 DF-GLS 统计量、PP 统计量和 LLC 统计量均小于 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由此可以认为各变量序列是平稳的。

在对 PVAR 模型估计之前,首次根据信息准则估计 P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提高 PVAR 模型估计的精确性。通过常见的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汉南-奎因信息准则(Hannan-Quinn information criterion, HQIC)以及贝叶斯信息准则(Schwarz information criterion, SBIC)测算 PVAR 模型的滞后期。

表 2 PVAR 模型滞后项确定

滞后阶	AIC	HQIC	SBIC
0	-11.216	-11.141	-10.983
1	-13.501	-13.053	-12.100
2	-15.047	-14.225*	-12.478*
3	-15.222*	-14.026	-11.485

注:*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 2 可知,PVAR 最佳滞后阶数为 3 阶。在确定滞后阶数以后,对本文使用的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在滞后 3 阶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变量组合在 10%及以下显著性水平通过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银行税负与银行信贷规模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商业银行税负影响信贷规模,而信贷规模是商业银行税负的强格兰杰原因,这与商业银行税负有关。

表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变量	冲击变量	系数	自由度	P
lnFT_hp	lnCredit_hp	40.267***	3	0.000
	lnGDP_hp	29.585***	3	0.000
lnCredit_hp	lnFT_hp	6.250*	3	0.100
	lnGDP_hp	18.581***	3	0.000
lnGDP_hp	lnFT_hp	1.673	3	0.643
	lnCredit_hp	7.5342*	3	0.057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脉冲响应分析

考虑到格兰杰因果关系实证结论以及主要考察商业银行税负对经济稳定的影响,故将商业银行税负排在脉冲响应函数的第一位。而经过多次测算,发现将其他变量放在首位后脉冲相应结论差异并不明显,这表明将商业银行税负放在首位的脉冲响应分析结论是稳健的。通过对 PVAR 模型进行蒙特·卡罗(Monte Carlo)模拟 200 次得到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分析商业银行税负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传导机制和路径。^①

3.1.1 商业银行税负影响银行信贷

商业银行税负波动过程中出现的信贷紧缩以及资产价格下降抑制了部门信用贷款,信用贷款的限制政策会对经济市场的波动造成持续深远的影响。商业银行税负波动引起了信贷市场的收缩,银行可能限制信贷。同时,资产价格下降可能反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这两者共同作用可能会对企业 and 个人的融资能力产生影响。由于信贷限制和资产价格下降,信用贷款可能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这样的信用收紧可能会对企业的生产和个人的消费产生负面影响,对整体经济活动形成拖累。^①在商业银行税负标准差冲击下,商业银行的信贷会在同期显著下降。这可能是由于税负波动引起了银行在贷款审批和资产配置方面的谨慎态度,从而导

①由于篇幅限制,受到冲击后的脉冲响应结果均被省略,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致信贷的减少。但冲击的持续性较短。随着时间推移,税负的影响逐渐减弱,银行信贷呈现小幅驼峰状的波动;②商业银行信贷的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同向影响十分显著,商业银行信贷的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时间模式。在冲击发生的当期,信贷冲击对经济波动并没有直接产生增加的影响。相反,经济波动在随后的3~4期,逐渐达到峰值,然后呈现震荡中衰减的趋势,并在18期之后趋于收敛。这一模式可能反映了信贷市场对税负波动的延迟响应以及波动的逐渐缓解过程。

3.1.2 商业银行税负影响宏观经济波动

商业银行税负对经济波动为较小的正向影响,并保持稳定的态势,表明税负的增加对经济波动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影响幅度相对较小。在当期面对商业银行税负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下,经济波动在当期小幅上升,在3~4期时达到峰值,之后经济的波动性逐渐减弱,在20期之后保持平稳的收敛状态。这一时间动态揭示了税负冲击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随后的逐渐缓解过程。该实证结论表明商业银行税负确实会对经济波动的增加产生抑制作用,这意味着,尽管税负的波动确实对经济有一定的影响,但其效应相对较弱,相较于银行信贷,税负对经济波动的贡献较小。而与间接途径相比,商业银行税负对经济波动的冲击效应明显小于对银行信贷的冲击效应。可能是与税负有关的其他经济变量相比,税负的直接影响在波动中的作用相对较弱。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税负对经济波动的脉冲响应分析,可以得出商业银行税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既具有滞后性又具有波动性。这说明税负变化不仅在其发生时对经济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时间上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与信贷方式相比,商业银行税负通过直接渠道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直接。这可能涉及税负对银行自身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通过银行体系传导到整体经济中。尽管商业银行税负通过直接渠道对经济波动产生影响,但这种直接影响的作用效果相对较小。这表明,与其他因素(可能是间接途径或其他经济变量)相比,商业银行税负对整体经济波动的贡献程度相对有限。这一结论可能对制定经济政策和维持经济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启示。如果商业银行税负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政策制定者在考虑促进经济稳定性时可能更需要关注其他因素,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或其他结构性因素。

3.2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解不同内生变量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影响程度,从而考察PVAR模型中扰动项对内生变量波动的贡献度,以分析不同内生变量冲击的重要性。表4报告了基准PVAR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

表4 方差分解结果

被冲击变量	期数	lnFT_hp	lnCredit_hp	lnGDP_hp
lnFT_hp	1	1.000	0.001	0.000
	10	0.833	0.085	0.039
	20	0.692	0.094	0.036
lnCredit_hp	1	0.193	0.791	0.120
	10	0.214	0.503	0.193
	20	0.198	0.468	0.186
lnGDP_hp	1	0.001	0.184	0.857
	10	0.016	0.201	0.701
	20	0.027	0.201	0.632

由表4可知,在第1期,银行税负变量变化完全来自本身的冲击。银行税负变量冲击对信贷变化的贡献率为19.3%,表明银行税负变量冲击显著降低了银行信贷规模。反之,银行信贷的方差中只有0.1%是由银行税负变量贡献的,说明银行税负降低银行信贷的这种影响是单向的。银行税负变量和银行信贷变量的方差在第10期占经济波动方差分解的1.6%和20.1%,表明银行税负变量和银行信贷变量确实引起了经济波动,其中银行信贷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此外,银行信贷的方差中有19.3%是由经济波动贡献的,并且第10期和第20期的方差分解结果几乎相同,说明经过10个预测期后,系统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从3个指标间动态互动关系上看,银行税负变量和银行信贷变量增加了经济波动,其中银行信贷变量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更大。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银行信贷是引起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比例大概占了1/5。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影响着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本文运用PVAR模型研究商业银行税负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考察了金融业税收制度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银行税负与信贷变化呈现负相关,商业银行税收通过信贷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商业银行税负影响信贷规模波动,最终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稳定,如何控制合理的信贷规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险,是今后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的问题。

(2)通过相应脉冲响应分析,商业银行税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时间的积累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商业银行税负通过影响实体经济资本存量需要一定时间效应,才能够最终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3)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商业银行信贷的冲击能够解释近 1/5 的宏观经济波动。此外,商业银行税负对经济波动的冲击影响程度大部分是通过商业银行信贷渠道而实现的,这充分表明商业银行信贷是经济波动的最主要因素。

4.2 建议

4.2.1 完善金融业“营改增”后续政策,降低商业银行总体税负

在我国供给侧改革中推出结构性减税背景下,应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税收负担,释放商业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活力,降低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确定风险。具体而言:①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经营业务的增值税税率,逐步理顺增值税抵扣链条,循序渐进将贷款利息支出纳入抵扣范围,降低流转税税负和市场交易成本;②实行针对商业银行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诸如对银行贷款损失予以一定减免、采取更为优惠的税率政策等,适度调整银行业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综合负担,实质性降低商业银行的总体税负。

4.2.2 强化税收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充分发挥商业银行职能

商业银行税负通过信贷影响宏观经济波动,表明商业银行与经济波动周期具有相关性,因此充分利用税收政策进行逆周期调控,对完善宏观金融调控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针对性制定符合商业银行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期更好地发挥商业银行中介功能,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充分考虑经济下行情况下经济增长可能面临的复杂形势,利用逆周期调节降低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减少经济波动的风险,以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4.2.3 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增强税收政策在引导银行信贷规模中的作用,降低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以避免银行信贷亲周期行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以深化财税改革为契机,拓宽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渠道,努力推进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与经济增长相匹配;加强税收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配合,强化“精准施策”,共同

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4.2.4 税务部门应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充分释放税收“红利”

为了促进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应该采用“温和”“渐进”的税收政策,推动商业银行通过合理的调整行为来降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在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过程中,充分关注和研究商业银行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行施策”,特别是脱实向虚、服务实体、资产证券化等方面的情况,引导和促进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税务部门应该完善和细化创新型金融工具或产品的税收监管细则,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技术,强化对“非货币化”金融工具进行有效的税收监管。

参考文献

- [1] PRAHALAD O K, HAMEL G.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 66: 79-91.
- [2] DENIZER C, IYIGUN M F, OWEN A L. Finance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R]. Contributions to Macroeconomics. Berkeley: Berkeley Electronic Press, 2002: 427-481.
- [3] 刘阳, 侯孟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信贷行为与风险承担关系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1): 141-145.
- [4] 郝威亚, 魏玮, 周晓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7(2): 151-159.
- [5] 杨海生, 陈少凌, 罗党论, 等.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4(9): 13-28.
- [6] NARAYAN P K, NARAYAN S. The short-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evidence from regional panel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13, 29: 70-78.
- [7] 王怀明, 桑宇, 虞晨阳. 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周期时变效应研究——基于 MS-VAR 模型的分析[J]. 金融经济研究, 2016, 31(4): 15-24.
- [8] 赵全厚. 论促进金融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完善[J]. 税务研究, 2020(1): 14-19.
- [9] STIGLITZ, JOSEPH E, ANDREW W.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3): 393-410.
- [10] BERNANKE B S, MARK G, SIMON G.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 [J].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1, 1999, 53(1): 1341-1393.
- [11] AUERBACH A J. Taxes, firm financial policy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Pub-

- lic Economics, 1984, 23(1): 27-57.
- [12] GIAVAZZI F, JAPPELLI T, PAGANO M. Searching for non-linear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evidence from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0, 44(7): 1259-1289.
- [13] Romer C D, Romer D H.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tax changes: estimates based on a new measure of fiscal shock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3): 763-801.
- [14] DREHER A.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on taxes and social policy: empirical analysis for OECD countrie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6, 22(1): 179-201.
- [15] 闫肃. 中国金融业税收政策研究[D]. 北京: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
- [16] 黄宪, 熊启跃. 银行资本缓冲、信贷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J]. 国际金融研究, 2013(1): 28.
- [17] KASTROP C, CIAGLIA S, EBERT W, et al. Fisc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vulnerabilities: implications for Euro area surveillance[J]. Applied Economics, 2014, 46(6): 603-615.
- [18] 邢锋. 金融业税收与经济增长关联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税务研究, 2020(1): 34-38.
- [19] 欧卫东, 李殿相, 李秋然, 等. 浅论金融深化对中国税收增长的影响[J]. 税务研究, 2019(4): 98-103.
- [20] 尹音频, 王晓慧. 金融产品税收制度优化探析[J]. 税务研究, 2020(1): 20-24.
- [21] 方福前, 邢炜. 经济波动、金融发展与工业企业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变[J]. 经济研究, 2017, 52(12): 76-90.
- [22] 逯进, 王金涛.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稳定与波动的动态关联——基于中国 2007—2019 年数据的分析[J]. 商业研究, 2020(5): 26-33.
- [23] 刘骏, 刘峰. 财政集权、政府控制与企业税负——来自中国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14(1): 21-27.
- [24] 钱先航, 曹廷求, 李维安. 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J]. 经济研究, 2011, 46(12): 72-85.
- [25] ARELLANO M, BOVER O. 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5, 68(1): 29-51.

The Tax Burden, Credit Scale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of Commercial Banks: Based on the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PVAR) Model Analysis

CUI Wenxing¹, YANG Yanwu¹, LI Chao²

(1. Economics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2. School of Big Data Application and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Commercial banks serve as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are important sources of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The impact and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the tax burden of commercial banks on the macroeconomy by constructing a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PVAR) model were examined.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tax burden of commercial banks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credit scale and has a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on economic fluctuations with certain time lags. Moreover, the credit channel amplifies the impact of the tax burden of commercial banks on economic fluctuations, which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direct impact of bank taxes. In the context of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reduce the overall tax burden of commercial banks, strengthen the countercyclical role of tax policies, fully unleash the “tax dividend,” and thus reduce the uncertainty risks brought by economic fluctuations.

Keywords: commercial banks; tax burden; bank credit; economic fluctuations